

徹底批判資產階級的圖書館學和目錄學！

“圖書館學辭典”是我國圖書館界的一株毒草

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 1957 年級“圖書館學辭典”批判小組

盧震京編劉國鈞、李小緣合校的“圖書館學辭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當全國圖書館界正在渴望有一個新型的圖書館學辭典的時候，它的出版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但是，遺憾的很，這個所謂“辭典”竟是我國圖書館界的一株毒草，是一個沒有任何積極意義的新舊資料的大彙抄，根本談不上“辭典”性的學術著作。令人氣憤的是，作者頑固地堅持其反動的階級立場和學術觀點，假借抄襲“辭典”之機集中地販賣了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圖書館學的反動理論。大量的充滿毒素的東西或者完全陳舊的東西，是這個辭典的主要內容和基礎。而這一切都是和社會主義圖書館的党性原則和圖書館為無產階級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針鋒相對的。這個辭典的文風特別惡劣（大量地明目張膽地抄襲），內容極端反動，觀點嚴重錯誤。不僅其政治質量會給我國圖書館界帶來惡劣的影響，而且單從學術爭鳴的角度來講，也是我國出版事業的巨大浪費。為此，我班同學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對它進行了徹底的批判。

人們知道盧震京在抗戰期間出版過一部“圖書館學大辭典”。其中所有的思想內容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些圖書館技術也是陳舊過時的。因此，今天編寫“圖書館學辭典”首先就意味着要徹底突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內容、舊體系，重新創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新內容、新體系。在地主資產階級的圖書館學與無產階級的圖書館學之間，沒有任何調和的余地。這是對待這一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否認兩者之間的原則區別是根本錯誤的。但是編者和校者卻完全否認了這一關鍵問題。他們不僅不徹底否認前者，以批判的態度來適當利用前者的某些資料，

重新編制新型辭典；反而肯定了前者，並以前者作為辭典的主要內容和基礎，而以胡亂抄襲的“新內容”用來裝璜其腐朽的門面。

更加令人氣憤的，是編者和校者都對自己的作法恬不知恥，反以為榮。盧震京還自我吹捧地說：“修訂的方針是刪削失去時效的材料，增加蘇聯圖書館學、目錄學的譯著，解放後新出的材料以及補輯舊日遺漏的材料”。又說：“這部書雖是圖書館學大辭典的修訂本，但內容和形式都已和原書有很大不同了”。劉國鈞也貌似公正地批評這部書“博采兼收”，“成為客觀主義的資料集”。實際上這些引語都是騙人的幌子。揭開這塊幕布，就可以發現該書是一個十足反動的圖書館學著作的集結。在內容上，該書對幾十年前舊中國圖書館學家（如杜定友、劉國鈞、洪友丰、馬宗榮等）的陳腐得發霉的理論，奉為主臬而大肆其宣揚；同時又大拾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圖書館學家的牙慧，不分青紅皂白，一味照抄洋人；對於封建色彩十分濃厚和士大夫階級的東西，也都沒有加以任何批判。相反的，對於新中國圖書館事業和社會主義國家圖書館事業則極度輕視。無產階級的圖書館事業的理論和實踐，在這部“辭典”中根本沒有得到正確的和應有的反映。至於一些剽竊來的資料，有的是攔腰折斷，有的是辭不达意，不倫不類、非駟非馬，真令讀者啼笑皆非！這一切正可說明資產階級學者們的所謂“客觀”，所謂“超階級”，實質上無非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胡說，無非是為販賣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找尋市場而已。

編者使用“客觀”主義介紹的手法，直接公開地宣揚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毒素，對無產階級圖書館

學的階級本質和党性原則避而不談，從而抹煞了圖書館學的階級性。

封建的藏書樓思想，是以藏書為其主要目的，根本否認圖書館必須為人民服務，而片面地強調藏書的艱巨性和重要性。我們並不否認藏書對圖書館的重大作用。但我們認為藏書的目的，是利用書籍作為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向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武器。因此，我們將藏書看作為手段，而不是看作為目的。編者在“辭典”中到處故意強調藏書的艱難性，以達到為藏書樓思想進行辯護的目的，如在“五難”“六難”“八求”的辭條里，編者就不加批判地大肆宣揚這種觀點。如把封建文人收藏圖書以供玩賞的行為說成是“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艱事，最樂事”。又如對藏書的作用說成是“善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事”。似乎古書的保存，全是地主階級的功績，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人類文化的保護者。

在“禁書”的辭條中，把禁書說成是“封建社會官府查禁違碍的書籍通稱為‘禁書’”。這完全暴露了編者的封建正統觀念。為什麼不從人民的立場來解釋什麼叫“禁書”呢？無產階級禁的應是什麼書呢？而非要從地主階級的立場來解釋“禁書”！

編者除了大力宣傳封建主義的東西外，更多地販賣了資產階級的陳腐的貨色。特別應該指出，辭典校者劉國鈞所有一切的資產階級觀點，在“辭典”中得到了全部反映。限於篇幅，現在只就幾個主要問題加以揭露和批判。

在“圖書學”辭條中，編者介紹了中外各家的說法，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不談圖書的階級性。難道真的圖書學就是研究“圖書材料、著者、印刷、版本、時代、裝璜、採集以及其它內容，體裁分類，歷史等等的科學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一切社會現象必須從階級觀點上去認識。圖書學首先應對圖書之作為階級鬥爭工具，它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及其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的历史進行研究。其次才研究圖書的物質形態。可是編者閹割了圖書學的階級性，而侈談圖書的組織要素。這決不是編者的疏忽，而是有意在宣揚劉國鈞關於圖書學的反動觀點。

圖書選擇是歷來統治階級非常重視的事情。因為事實上這就是圖書為誰服務的問題。在反動統治下，大量採購和流通的是那些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

的圖書，而對有利於人民的進步的書籍，如馬列主義等是被打入冷宮，不讓在讀者中流通的。這不明明說明圖書選擇的政治意義嗎？可是編者在“圖書選擇”辭條中解釋：“選擇圖書，為圖書館方面一種經濟措置”。從字面上看來，似乎編者是在關心經濟節約，是對國家財產的護愛，但實際上則是叫人重視圖書的經濟價值，藐視圖書的政治標準，以便拖人陷入“超政治”的泥潭。

圖書館事業是國家文化事業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圖書館事業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圖書館事業有着本質上的區別。所以當我們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圖書館事業時，必須對它的反動本質進行揭露。任何客觀的無批判的介紹，實質上就是對資本主義的宣揚。而編者在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圖書館時，僅僅列表式的指出建館時間和藏書數量，而對它們的本質與作用避而不作解釋，使人覺得這些圖書館歷史悠久、藏書豐富，彷彿都是為全民所有的文化事業一樣。這種“超階級”的介紹方式迷糊了讀者對資本主義國家圖書館的本質的認識。

編者不僅從上述這類辭條中來宣揚圖書館學基本理論方面的資產階級觀點，而且在圖書館工作制度、圖書館建築、圖書館設備各方面也都存在同樣的情況。“勤儉辦館”，是我們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圖書館事業的原則，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而且近年來我國圖書館工作者在工作制度、建築設備方面都有很多的創造和優秀經驗，都應該充分介紹。可是編者並非如此，而去介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陳舊制度和豪華形式，如在“圖書館設備”條中編者介紹了1931年杜定友所提出的做法，要求“木料宜用上等硬木，體輕而美觀”，“顏色宜用淡黃、橡木色、或淡墨綠橄欖木色”等等。

另外從“圖書館學辭典”中所引用的材料看，編者不負責任的把那些陳腐過時，甚至帶有封建毒素的材料，毫無批判、不加選擇的照抄。這種態度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儘管編者在前言中官冕堂皇地寫道：“這部書雖是圖書學大辭典的修訂本，但內容和形式都已和原書有很大不同了。”不知所謂“和原書有很大不同”的地方究竟在哪裡？讓我們看看這部修訂後的“圖書館學辭典”所引用的材料吧。

全書共有8,695條，註有材料來源的，初步統計為1,430余條，而絕大部分都是1930年左右的材料。其中又多半是馬宗榮、杜定友、劉國鈞的一些

旧作。而对解放后我国的文教方针政策，以及图书馆事业發展的一些基本理論，苏联图书馆工作的先进理論及經驗，根本沒有得到应有的反应。讀者不禁要問：（1）为什么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現狀沒有給予充分的反映？（2）为什么要讓陈腐的反动的材料佔着这么大比重？（3）为什么不用今天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观点解釋辞义而却要用1930年左右的过时材料？編者“編写”这部辞典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刘国鈞在校后記里写道：“正是由于博采兼收，就成为‘新旧并列，中外杂揉’”。这真是弥天大謊！

作为图书馆学的灵魂和核心的图书馆学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在这部“辞典”中連影子也沒有，关于图书馆学的根本理論上的名詞，如“开门办館”、“办館的羣众路綫”、“宣傳好書”、“輔導閱讀”等等，也被无理地摒棄在一边。“流动書庫”、“流动图书馆站”、“流动图书馆”等七个有关能更好地体现为讀者服务、开门办館的名詞，也仅仅用了不到一頁的篇幅来作介紹。“推荐書目”是社会主义国家图书馆工作实践中的产物，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其党性原则是很强的。但“辞典”中只是不厭其烦地介紹了一些編制方法，对党性原则很少接触，就是有一点也只是当做編制方法而提出的。对于“字典”和“辞典”两条的解釋更是荒謬到極頂。在“字典”条中，从东汉的“說文解字”，到清朝的“康熙字典”，到英国的“牛津大字典”，从关于字彙的收集范围到擇圖，談的面面俱到，就是不談其政治性和思想性。在“辞典”条中，从“尔雅”到光明版的“辞通”，列举了十几部字典之名，但却連一个带政治性的詞兒也沒有。这位編者就是这样恶毒地从籠統到具体地拙去了图书馆学的政治思想内容。試問刘先生所謂“新旧并列”的“新”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辞典”的編者事实上否認了图书馆学是一門社会科学，而把它看做是一門管理学或方法学。这和刘国鈞先生把图书馆学当做是一門研究图书馆的組織法、管理法和使用法的科学，沒有半点两样。“辞典”編者正可說是刘先生反动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理論的热心的忠实的掘客了！

正是由于他抹杀了图书馆学的阶级性，拙去了图书馆学的政治思想内容，所以在介紹我国解放后图书馆事业的巨大發展时，就不能不流于形式主义的“客观”主义。

在“人民民主国家图书馆事业”条中竟采用1951年的材料来介紹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介紹时也仅例举了北京图书馆等几个館的藏書数目。在“中国图书馆事业”条中只是煩瑣地罗列一些館名和藏書数，并用了“不只質量上进行了整頓提高”一句話就把質量上的發展帶了过去，至于它的根本屬性——社会主义性質——却只字未提。

我們不禁要問：描述美国图书馆事业是一些数字的堆砌，描述我国图书馆事业也是一些数字的堆砌，难道两者之間就沒有半点区别嗎？

反动的资产阶级專家們，一向認為“今不如昔”，“中不如外”。这位編者也毫不例外。解放前的旧分类法，在解放后是很少能用的。在这迫切需要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分类法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圖書分类法”相繼誕生了。这本来是很有意义的事，但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中圖法”为“嚆矢”的編者，只簡單地、“客观”地、毫不加肯定地介紹了这两种分类法，而却不厭其烦地、詳尽地，用肯定的口吻介紹了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和刘国鈞的“中国圖書分类法”。对于“苏联圖書分类法(草案)”的介紹，編者閉口不談其强烈的党性和高度的科学水平；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圖書分类法，如民主德国圖書分类法也都絕對不提。

众所周知，克魯普斯卡婭是苏联的一位杰出的图书馆学家，她对苏联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对我国也發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还有許多苏联現代的图书馆学家如华西里青科、克連諾夫、葛里高利也夫、安巴祖勉、捷尼西叶夫等，在辞典中都是找不到專条介紹的。与此相反，編者卻花了很多篇幅来叙述资产阶级的图书馆学者，如杜威、布朗、克特等的“丰功偉績”。这难道就是刘先生所謂的“中外杂揉”嗎？！

苏联的图书馆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思想性最强的图书馆学，是我們學習的榜样。但卢震京对之并不予以全部肯定，并不詳細說明它的党性、人民性和科学性，以及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指导意义。如在“列宁論图书馆工作”条中仅仅抄了两篇列宁著作作为参考。由于編者根本沒有掌握列宁著作的精神实質，故而也就不可能指出这些著作对我们今天图书馆事业的指导意义。

特別使我們不能容忍的，是在“辞典”中出現了

不少政治上的錯誤。如在“西文圖書編目法”条中这样写着：

一个首名的西洋作家 Glossman, Vassili
stalin, I (約·維·斯大林)

两个首名的西洋作家 Lenin, V. I (尼·列宁)
把我們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領袖列宁、斯大林竟当作是西洋作家，这不能不說是編者在学术上的无知和在政治上的严重錯誤！

从这里，完全表现了編者对于文化知識的貧乏，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的无知。

通观全書，我們不难發現編者对于资产阶级圖書館学充滿着衷心欽佩、依依不舍之情，而对中國現代圖書館学、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圖書館学却抱輕視态度，完全不感到兴趣。这就无怪乎这部所謂“辞典”竟变成了一具披着新衣的殭屍了。

以上分析，清楚地說明了編者是站在極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場上来对待圖書館学的，是企圖通过这部所謂“辞典”来为沒落的资产阶级圖書館学招魂的。

“圖書館学辞典”不仅是一部錯誤百出、內容陈旧的資料集，而且对于編者極端恶劣的編纂态度，对于編者的名利思想，我們也决不能置之不理。我們要向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和名利思想宣战！

卢震京为什么要編这部辞典的呢？他說，“圖書館学大辞典的編輯目的在于搜集有关圖書的各方面知識”，又說“借此想替研究圖書館学、目录学、圖書学的人提供一种專門性参考工具。”我們說：这是墨写的謊言，是騙人的鬼話。你宣揚的是资产阶级圖書館学的反动学术观点，你所追求的是名和利。“圖書館学辞典”就是作为向社会主义圖書館事业进攻的跳板，并作为索取名利、往上爬的阶梯！

現在来看看編者是怎样进行編輯工作的吧！

剪刀与浆糊，这是編者的主要工具。編者所剪的材料，远的有1933年以前的旧作，近的有1957年的講义；不管是鉛印、雕板或油印；不管是資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管是公开发表的，还是私人的手稿；也不管是否与圖書館学有关，但凡带有“圖”、“書”、“画”字样的名詞也好，書名也好，編者都大刀闊斧地整篇整节的剪了下来。洋洋1,194,000余字的“辞典”，就是这样借助剪刀和浆糊的威力剪貼而成的，絕少真正是自己編

写的东西。这就是校者所說的“博采兼收，搜罗宏富”的真相！这种肆无忌惮的大量剽窃的行为，实在令人髮指！

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編者所抄的东西多是片面的。把別人的著作或拦腰截断，或东拼西凑。如各种类型圖書館的分析，就是从北大、武大的圖書館学講义上拼凑起来的。“圖書採購”、“圖書选择”、“圖書保护法”、“圖書保障率”等，都是抄襲北大圖書館学系的“圖書館藏書”講义的，里面沒有一句話是編者自己的。这样，不仅破坏了原著的系統，更可怕的是令人看了以后，思想糊里糊塗，不知其所以然。

至于还有根本不屬於圖書館学范圍的东西，也被編者装入“辞典”中，有时还歪曲其原意。如把“中篇小說”解釋成“篇幅較短篇小說为長，約有数千字到数万字的小說”，把“小說”說成是“凡屬瑣細記載”……諸如此类，胡言乱語，又何止出于偶然。

仅仅以上几点已足以說明卢震京的編輯态度是極不严肃的。难道說，这样的东抄西襲，东拼西凑，就叫做搜集有关圖書館学各方面的資料嗎？！难道說，这些杂乱无章而含有毒素的資料就叫做給讀者提供一种專門性参考工具書嗎？！这真是騙人的鬼話！

在严重的名利思想的支配下，編者在前言中說出了心里話：“搜集整理需要很多的时间”，若真要細心的搞“势必曠日持久”，“又难以尽快成書”，“有劳讀者的盼望”。那么，最簡捷的方法就是剪貼了。难道讀者盼望的竟是这样一种不倫不类的东西嗎？！

最后，我們对校者刘国鈞先生的校后記提出严厉的批評。“圖書館学辞典”明明是毒草，可是他却把它捧得很高，企圖向讀者宣傳，把它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向圖書館干部进行灌輸，陷害讀者。而且我們認為校者也是極不負責的。除了在学术观点上保留自己的反动“学术”外，对編輯文字上的錯誤百出，也不予以校正，不知校者是真正的校者，还是为了掛塊“权威”的牌子？

总而言之，“圖書館学辞典”是当前我国圖書館界的一株毒草。它的出版和傳播会对我国圖書館事业带来極其恶劣的影响。我們應該坚决剷除这株毒草！